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求更高的理论自觉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是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且由于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它必将引起整个社会生活即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的剧变在这种剧变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将得到根本性的改造，这就是社会转型。

从世界范围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前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开始于 16 世纪。在历史上，这个社会转型过程即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密切联系的。14、15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当时的“地理大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导致了殖民主义的扩张，加速了商品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英国于 18 世纪率先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以及美国也相继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它们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迅速推进了经济社会

化、市场化的进程，并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现代化的进程从西欧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亚洲的日本也进入了现代化的行列。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民族革命纷纷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也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汇入了世界现代化的洪流。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从近代开始的社会转型过程正是各民族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显然，各个民族是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下走向世界历史的。由前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人类历史的一般趋势，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实现这一社会转型的道路则是各各特殊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将首先实现这一转型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称为“先发国家”，而把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才真正进入这一转型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称为“后发国家”。这种区分是有重要意义的，它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揭示了两种社会转型过程或世界现代化的两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的历史特征。

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有着不同的历史起点，并且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原生的，它是随着新的经济关系在旧的社会结构中日渐孕育成熟而自发地、逐步地成长起来的。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商业迅速发展起来，资本向全世界扩张，并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但这个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殖民化的过程，即是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以地球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代价的。在这样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先发国家显然处在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

因此，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尽管也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但这种制约作用是很有限制的，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发国家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发国家是被“逼”上现代化的进程的。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剥削，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很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普遍呈现出少量先进的工业经济和大量落后的农业经济二元并存的状况；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演变中缺乏刺激文化转型的变革因素，后发国家在文化观念的变革上也长期滞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且由于缺乏必要的健全的消化机制，民族文化同世界文化的结合或世界文化的民族化异常困难，乃至常常容易发生偏离现代文明主流、与现代文化精神相背离的现象；在政治上，后发国家虽然争得了民族独立，但由于受经济、文化状况的制约，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相当艰难和缓慢。可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起点较低、准备不足的特点，显示出同现代世界发展水平和趋势的诸多不适应、不协调的状况。而在现代条件下，这种不适应、不协调便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随着资本的国际化过程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扩大，特别是随着 20 世纪以来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相互制约的世界经济体系，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再也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立地求得生存和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环境对于后发国家发展的制约作用无疑会更显强烈，后发国家同现代世界发展水平和趋势的不适应、不协调所带来的问题也更加严重和复杂，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加艰难。总之，不论从自身

状况和外部条件来说，后发国家不可能再走先发国家的道路。

“先发”可为“后发”所借鉴，却不可作为“后发”的榜样。后发国家必须独立地探寻既适合现代世界历史条件又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属于后发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具有后发国家所共有的特点，但又具有它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有的特点。这不仅在于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地理、人口、资源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进程所创造的独特的历史前提，这个独特的历史前提就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自觉地开始了现代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自这一过程的开始就是明确的，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却一直在探索之中。我们曾在一个较长时间里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因此，从实质上说，我们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一个较长时间里也都只是停留在现代社会转型的门坎上。这种历史情况，不能不对我国的社会转型或现代化过程产生双重的影响。我们既要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前提，又要努力探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并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实际的情形往往是，当我们强调探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道路时，容易把现代化和西方化混同起来而忘记社会主义的前提；而当我们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强调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相区别时，又容易弹回到我们已经走过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路上去。这说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近 20 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这种探索开辟了广阔的途

径，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这一伟大探索的理论结晶，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亦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指导思想。但是，这种理论探索并没有完结，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也需要经过同样的努力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长期性以及它在中国实现过程的特殊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

二、中国社会哲学的首要的理论任务

达到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高度的理论自觉，必然依赖于对于这一过程的哲学把握。社会转型是社会的整体性变动即结构性变迁，它不只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而且更主要的是社会的结构方式的变化。对于这一过程的深刻理解不能不求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从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中求得对于对象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各自的角度去探寻各种社会问题的理论解决的，但这种解决只是局部性的。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全面的整体的把握，固然依赖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但更加需要的是在此基础之上依靠哲学的理论思维超越具体科学的领域局限，去把握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特征和深层本质。事实上，各种社会科学也都力图在对社会过程的总体把握中解决自己领域的问题，因而越来越关注哲学的研究，希望从哲学中寻求共同的逻辑基础和观念框架，以便更好地实现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过渡和贯通，使各种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成为可能的和有效的。显然，在社会研究的领域里，

直接担当这种哲学任务的，便是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社会哲学。

社会哲学正是以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或者说，是以社会结构的研究作为考察社会生活的出发点，去研究那些只有通过社会结构的剖析才能从理论上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哲学在当前的首要的理论任务，无疑应当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应当是揭示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趋势，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哲学把握为考察和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

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结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存在着三种基本的需要，即一定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一定水平的生活意义。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便是分别满足这三种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们构成了人类活动亦即社会生活的三大基本领域。从可能性上说，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从现实性上说，又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人类活动能力的限制，不能够充分地满足这三方面的需求，而只能将无限的需求有限化，即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将各个方面的需求协调在一个保证人的正常生存的可实现的范围内，这就规定了社会诸领域的结构方式。

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其适合于各自历史条件的独特的结构方式，而决定社会结构方式的历史条件，主要的就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状况。按照最一般的历史尺度，我们据此可以把自文明时代以来的社会划分为社会分工与交换不甚发达的非市场经济社会和比

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在非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分工不发达，人们以分散的方式从事生产，自给自足，缺乏一种由分工造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各个个体之间也就缺少一种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便不能依靠经济的力量，而必须主要地依靠超经济的力量去整合分散的个体。这种超经济的力量首先是政治的强力，同时也包括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在这种社会整合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水平一般地可以大体稳定，而社会秩序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大范围内波动。这就使得一定的社会秩序的获得和保持对于人类生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而使得主要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动具有了特别突出的中心地位，而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则须服从于政治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将自己限制在不损害社会秩序的范围内。换言之，社会对于秩序的需要构成了物质需要和意义需要的界限。在这样的社会里，诸领域便必然是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直接地统合为一体的，这种社会结构方式可称之为领域合一的结构方式。

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体之间的分工有了高度的发展，由此造成了个体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每个人的生活资料的获取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换活动，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人们的经济活动高度地社会化，人本身也高度地社会化。这就是说，分工与交换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把各个个体结合起来的力量。这样一来，经济活动便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以往主要由政治活动执行的社会整合功能，因而使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的情况在客观上逐渐发生变化。这就必然导致先前那种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将诸领域统合为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形成各领域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

方式。

考诸实际，诸领域的相对分离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像美国那样的“后工业社会”已达到了一种“领域断裂”的程度。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诸领域的相对分离也已初见端倪，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政企分离”。“政企分离”可以说是社会结构从领域合一趋向领域分离的一个重要标志。市民社会的兴起，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自主社会领域的逐渐形成，也明显地表现了领域分离的趋势。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是从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无不受着这一基本趋势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把握这一基本趋势，便成为我们考察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指导线索。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研究包含了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内容，例如，关于经济活动的特点和功能，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和运行机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关于政治活动的功能及其变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和途径；关于文化活动的功能，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运作方式的转变包括文化各层面的分离和整合，以及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其中特别是伦理重建和信仰重建；关于作为社会基本价值的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社会代价问题；关于社会各领域的功能整合以及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与稳定，等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论探索，都只有将其置于社会结构的领域分离这一基本趋势的观照下才能有清晰的解决思路，才有可能通过分析和综合而达于对社会转型过程的整体把握。

实际上，领域合一的状态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领域分离的状态则使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突显了出来。领域的相对分离并不是各领域之间互不相干，而只是表明各领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社会结构方式的改变或调整，往往集中地表现在这种张力的调节上。张力过小，实际上就是趋近于领域合一；张力过大，则造成各领域之间不合理的疏离乃至对峙。因此，各领域之间的张力的不断调适，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转型过程成熟程度的一种标志。可见，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表明了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社会整合的形式和途径日趋多样，因而也表明了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理论任务日趋紧迫，而这正是社会哲学在我国兴起的现实基础

三、社会哲学的理论和方法

从严格意义上说，构成系统化理论的社会哲学是近代才产生的。这除了哲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前的社会历史过程尚未充分准备社会哲学得以产生的条件。近代以来，西欧社会进入了由前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以及由于社会矛盾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社会运动的整体性特征日益显露，因而在客观上具备了研究和揭示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的基础。同时，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于这急剧变化中的诸多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把握，也只是通过对于社会结构的剖析才有可

能。可见，以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哲学正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在这一社会转型时间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创立了完整的社会哲学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他们分析了商品经济形式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他们的政治、历史著作中，他们考察了转型时期欧洲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他们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人的生存状况，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根源以及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考察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从各种社会矛盾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社会整体运动中揭示了欧洲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们不仅深入地研究了欧洲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过程，而且在同欧洲社会的对比中对东方社会的社会特征和发展道路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都是社会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卷帙浩繁的理论著作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在事实上有两个基本的理论维度，即历史哲学的维度和社会哲学的维度。历史哲学的维度是对于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的、辩证的本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理论；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通过对于当时以英国为典型的欧洲社会的剖析而提出的关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内在本质的理论。历史哲学这一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哲学这一维度却常常

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忽视了显然，这两个理论维度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不会有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

从学理上讲，社会哲学应是历史哲学的基础。马克思曾经严厉地批判过旧的历史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旧的历史哲学是从观念出发，用臆想的联系代替历史过程中的真实联系，力图构造适应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永恒公式。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超历史的也就是无用的，是在任何历史时代都不起作用的。马克思坚持摒弃了旧的历史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一般地反对任何历史哲学，或者说在哲学中排除了历史哲学的维度。相反，马克思恰恰是在批判旧的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的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是在同旧的历史哲学的对立中正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哲学的维度。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去揭示历史过程中的真实联系，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观察中抽引出一般的理论结论，不致使历史哲学成为脱离现实历史的“独立的哲学”。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或一般趋势的理论，就是通过对当时欧洲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剖析而做出的哲学概括。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维度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社会哲学这个维度就会退到旧的历史哲学。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维度的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卷，第131页。

系，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对于理解我们当前的哲学研究任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的某些研究者们常常在实际上是用旧的历史哲学的方式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因而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陷入一种抽象化的理解。由于割断了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同现实历史的联系，因而或者以现实历史的变化而否定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或者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当做僵死的教条和公式去匡正和裁剪活生生的现实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非常清楚：“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①唯物史观是植根于现实历史的，也只有回到现实的历史中去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必须研究变化中的社会生活，研究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从这个根本点上说，抛开社会哲学的研究，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就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可能走到旧哲学已经走过的歧路上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哲学研究曾成为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基础，其理论成果也曾在引导社会变革的实际运动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且至今仍保持着巨大的价值和魅力。不仅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仍是我们应当依据和遵循的，它的许多具体的理论结论也仍有现实的意义。尽管我们处在社会转型过程的后发阶段，但许多问题是整个转型过程所共同具有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仍须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欧洲市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经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剖析，对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就对我们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的社会哲学研究工作，无疑应当首先发掘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这方面的丰富内容。

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做出的理论结论上，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已经相距一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生活和世界历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如前所述，后发国家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和面临的世界格局与先发国家大不相同，各个后发国家的国情也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适合自己时代、自己国情的社会哲学。社会哲学不是超时间的，也不是超空间的，企图搬用任何一种超出自己生活的时空范围的社会哲学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种企图也无异于取消社会哲学本身。

社会哲学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但这种研究应是哲学层面的，应与实证的社会科学不同。某些社会科学也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包含着对于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如经济学研究经济结构，政治学研究政治结构，文化学研究文化结构等等。但是这些都只是社会局部领域的结构关系，而社会哲学则是要打破各个学科的领域局限，把社会视为活生生的有机体，去把握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当代某些社会学理论是力图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结构的，它们对于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研究更接近于社会哲学的层面。但是，一般说来，社会学是侧重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构成以及人在社会群体和组织结构中的角色地位，以实证的方式揭示社会结构的存在样态及其内部各种角色的相互关系。

社会哲学则是从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理解出发，把社会结构看成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从人类活动的结构及其变化去说明一定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因而它不是停留于观察的经验层面，而是能够探寻社会结构形成和演变的深层原因和深层本质。正因如此，社会哲学也就具有一般哲学所具有的反思性、批判性，它不仅仅考察社会结构本身，而且批判地考察人们关于社会结构的种种观念，从而为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基本的观念框架。

四、社会哲学和终极关怀

对于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不仅应当从它同社会生活、同各种社会科学的关系中去理解，而且它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还应当从它同哲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关系中去理解。

哲学就其本性来说，是对于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哲学固然有认识论、方法论的功能，它应为人类活动（首先是认识活动）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但是，它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功能也是体现于和从属于终极关怀这一功能的。社会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或领域，同样具有哲学的一般功能，只不过它有体现哲学一般功能的特殊角度和实现哲学一般功能的特殊方式而已。

近年来谈论终极关怀的文字多起来了，这说明哲学在反思自身的过程中逐渐重新认识了自己，这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毋庸讳言，也出现了泛泛地谈论“终极关怀”以至使哲学更加远离生活的浮泛化的倾向这一问题的解决，或者

说，哲学的真正本性的澄明，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哲学层面的思考。

所谓终极关怀，即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终极理想、终极意义的探求。终极意义当然不是人类生活的当下直接的意义，而是超越当下直接现实的意义，但它必须是针对着现实生活的，是对于现今现实生活的具体的超越。不能把终极关怀或终极意义误解为某种历史的终极目标所具有的意义，历史是没有终极目标的。终极意义作为理想的意义，只能体现于对于直接现实的具体的超越，因而每一种趋向于理想目标的对于现实的超越都包含着某种终极意义。哲学所追求的应当是一种包容了现实情景在内的具体的终极关怀。将理想的终极意义与现实生活会通，正是辩证哲学所要求的具体性。显然，作为对于现实社会之总体把握的社会哲学研究便是实现这种会通的必要途径。

社会哲学研究特定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化，但它不是将社会结构当做同人的生活无关的抽象物。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是将一定的社会结构视为人类活动的产物，且视为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因此，它不只是研究社会结构本身，而且更要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中的人，研究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的活动和人的生存状况，为人们的生活寻求意义支撑。试想，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哲学？这就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的意义的追问以及期待哲学的解答也大不相同。而人们为什么过着不同的生活，又为什么会有对于生活意义的不同的追问，便只有从对于各自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解剖中才能得到说明。可见，离开社会哲学的研究，所谓哲学的终极关怀就难免流于玄虚的空论。

就一般意义而言，终极意义总是同自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各种哲学对自由的理想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终极意义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哲学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探究如何达到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境界，并使他们所设拟的终极理想能够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具体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提出的自由观念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是对于扬弃异化劳动的社会状态的一种构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终极关怀或终极理想，曾经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其强大的意义支撑，它激励和鼓舞着一代一代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通过自己的斗争去实际地超越当时的直接现实，朝着这一理想的目标前进。但是应当看到，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提出的人的自由发展观念在后人的解释中曾一再地受到误解；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百多年来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今天必须根据改变了的社会现实去探究将这一理想的终极意义与现实生活会通的新的进路。

在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当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大地建立起来时，人们以为从此就告别了或超越了市场经济，从而扬弃了异化劳动及私有财产，步入了理想社会之大门。然而，与人们这种简单化的愿望相反，现实历史却选择了一条复杂得多的道路。市场经济并没有被超越，它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实，它冲毁了已有的信念之网。人们在计划经济和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念越来越难以找到现实生活的依托，所谓“意义失落”、“信念迷惘”成为在许多社会成员中普遍发生的

现象。这种情况给我们的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重建指向自由发展之理想的“通天塔”，帮助处在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人建起一个可供选择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便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根本和最紧迫的任务。这一时代赋予的哲学任务，无疑应当首先由社会哲学担当起来。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的任务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逻辑，这主要的就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国家命运、观察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观念框架，提供一个基于对这种逻辑的深刻理解的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这实际上就是提供一种植根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终极关怀。

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我们的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哲学的研究，必须既坚持哲学的终极理想性又坚持哲学的现实性，努力克服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和浮泛化倾向。。实证化的倾向忘却了哲学自身的使命，丢失了哲学的本性，是为“失职”；浮泛化的倾向离开了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具体把握，喜好于从各种书本中寻章摘句，去拼凑浮泛的缺乏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是为“渎职”。真正的哲学是把握在精神中的时代。我们开展社会哲学的研究，或者说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社会哲学的难度，其要旨也正在这里